

许涤新等著

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报告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国民经济 发展中的问题

——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报告文集

许涤新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许涤新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排版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650×1168毫米 32开本 5 1/8印张 95千字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统一书号：4190·081

定价：0.51元

前 言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美两国经济学者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拉森举行了“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这次会议是一九七九年十月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时商定的，经过一年的筹备，中美学者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学术讨论的计划，顺利实现了。

根据双方商定的议程，会议讨论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农业、工业平衡；消费、投资的平衡和宏观经济战略；平等、增长和基本需要；工业化、外贸；技术、环境和技术转让；就业、人力资源；制度方案的选择；集中经济和分散经济中的计划。围绕这些问题，我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有七个发言，美方学者有十八个发言。开幕时，代表团团长许涤新同志和艾德曼教授致开幕词；闭会时，许涤新同志和路易斯教授作了总结性的发言。

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中美学者各抒己见，共同探讨，不同看法也在会上争论，学术气氛比较浓厚。经过四天的讨论，交流了学术观点，加深了相互了解，增进了中美经济学者之间的友谊。

正式参加这次讨论会的，美国方面有：加利福尼亚大

学教授艾德曼 (Irma Adelman), 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罗 (K. J. Arrow), 世界银行顾问、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巴拉萨 (Bela Balassa), 哈佛大学教授多尔夫曼 (Robert Dorfman), 海牙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埃莫累吉 (L. J. Emmerij), 埃塞克斯大学教授希尔 (G. C. Heal), 日内瓦国际劳动组织、经济学家霍普金斯 (M. J. Hopkine), 世界银行顾问、经济分析与规划部主任休斯 (Helen Hughes), 斯坦福大学教授刘遵义,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路易斯 (W. A. Lewis), 耶鲁大学教授蒙蒂斯 (J. M. Montias), 哈佛大学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珀金斯 (D. H. Perkins), 耶鲁大学教授伦那斯 (Guetav Rannis),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罗宾逊 (Sherman Robinson),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蒂格利兹 (J. E. Stiglitz), 加利福尼亚大学助理教授泰森 (L. D. Tyson),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王尔德 (Benjamin Ward), 世界银行顾问威斯特法尔 (L. E. Westphal), 中国方面正式参加会议者: 许涤新、赵复三、滕维藻、徐绳武、廖建祥、董辅初、柳随年、曾启贤、项启源、梁文森。在本书发表的, 是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供的七篇文章和许涤新同志在会议开幕、闭幕时的发言。文章顺序按发言次序编排。

目 录

前言	(1)
----------	-------

中美关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开幕发言

.....许涤新	(1)
----------	-------

中国经济发展中工业和农业的平衡问题	梁文森 (3)
-------------------------	-----------

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	董辅初 (26)
-------------------------	------------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收入分配	项启源 (47)
-----------------------	------------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外贸型式	滕维藻 (71)
----------------------	------------

中国工业企业的大中小并举方针与技术方法选

择问题	廖建祥 (93)
-----------	------------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	曾启贤 (107)
--------------------	-------------

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管理问题	柳随年 (129)
--------------------	-------------

中美关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闭幕发言

.....许涤新	(148)
----------	---------

会议有七个发言，美方学者有十八个发言。开幕时，代表团团长许涤新同志和艾德曼教授致开幕词；闭会时，许涤新同志和路易斯教授作了总结性的发言。

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中美学者各抒己见，共同探讨，不同看法也在会上争论，学术气氛比较浓厚。经过四天的讨论，交流了学术观点，加深了相互了解，增进了中美经济学者之间的友谊。

正式参加这次讨论会的，美国方面有：加利福尼亚大

中美关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 讨论会”开幕发言

许涤新

筹备已久的中美关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现在开幕了。“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以极高度的热情，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代表我们的代表团，向会议致以热烈的祝贺！并预祝会议的成功！

中美两国经济学界的接触是一年比一年密切的。我们的友谊和我们在学术上的相互推动，也是一年比一年增进的。这次“中美关于发展战略抉择”会议的举行，更进一步地把中美两国经济学界的关系又推向前进！我相信两国经济学界将和两国人民一样携手前进，是无可怀疑的。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并不相同，在经济理论上，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这种不相同，并不妨碍我们两国经济学家的认真协作。中国人民最尊敬的周恩来同志，经常教导中国的学者和干部，在研究社会科学和在处理外事工作上，要“求同存异”。观点一致，当然很好；观点如果不一致，也要尊重对方的观点。实践证明，“求同存异”，是我们保持友谊、增进友谊的原则，也是我们搞好经济理

论，把经济理论向深处发展的原则。

现在让我再一次预祝这次会议的成功，并感谢约翰逊基金会和从事筹备这次会议的美国朋友，特别是埃·阿德尔曼教授的辛劳！

中国经济发展中工业和农业 的平衡问题

梁文森

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是国民经济中很重要的问题。有些发展中国家，或者工业落后，农业也落后，或者城市工业比较现代化，但农业仍很原始，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一个如何正确地解决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发展问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己的经济中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提出来讨论和研究。

中国在发展自己的经济中为什么要使工业和农业之间平衡？我认为：

(一) 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物质生产的两个基本部门，两者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农业部门职能的扩展，农业同工业部门间联系在不断地发展和扩大，两者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解决好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

关系，就为整个国民经济平衡发展铺平了道路，为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创造了物质前提。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目标中，没有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就难以实现，而没有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便无从谈起。因为工业和农业之间要相互提供服务，农业要为工业发展提供粮食、原材料、资金和劳动力，并且又是工业品的市场等。而重工业要为农业提供技术装备、化肥、农药、燃料，轻工业则要为农业提供日用消费品，等等。所以，工业和农业之间必须相互协调、平衡地发展，才能迅速地实现工业和农业现代化。

（二）农业对工业制约的作用，这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比在发达国家经济中更为明显。对于工业和农业都很落后，尤其是农业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现代化，实质上是要改变传统的落后的小农经济。这对中国来说，具有更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为中国人口多，80%是农民，解放初小农经济是汪洋大海。所以，中国在完成土地改革后，提出实现农业合作化，就是想同工业化的步调相适应，比较快地改变传统的小农经济的落后面貌。

以现代化大生产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建立在落后、贫困和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小农经济也不可能为大工业的生产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允许长时期呈现“工业发达、农业落后”、“城市繁荣、乡村偏枯”的局面。而是要使工业和农

业、城市和乡村平衡地发展，普遍地繁荣，在工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实现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富裕。

（三）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自己的经济中，使工业和农业平衡地发展，不仅是经济上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消灭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对立，但还存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必须逐步地消灭这种差别，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重新结合起来，使之在更高的基础上平衡地发展，才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

在中国解决好工业和农业的平衡问题。实质是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了调动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那末，什么是工业和农业平衡的标志呢？我认为，逐步实现工农业平衡发展的三个基本标志是：（1）工农业之间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结构比较合理、发展速度稳定而且比较快；（2）工农业净产值（国民收入）增长较快，除了能满足工农业本身扩大生产需要以外，还能满足其他事业发展的需要；（3）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增长，消灭贫困和落后，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提高，农村人口逐步转化为城市人口达到恰当的比例，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差别趋于消失，达到共同繁荣，工（人）农（民）

共同富裕。

二

三十年来，中国为逐步地实现工农业平衡发展的三个基本标志作了重大努力，在发展工业和农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950年到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9.4%，农业总产值4.5%，工业总产值13.3%，其中：轻工业11.0%，重工业16.5%。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国工人农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也有所改善。农民每人的平均消费水平，1952年为62元，1957年为79元，1979年为155元；职工每人的平均消费水平1952年为148元，1957年为205元，1979年为416元。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工农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49年的70.0%、1952年的56.9%下降到1979年的29.7%，而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49年的22.1%、1952年的27.8%上升到1979年的30.7%，重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则从1949年的7.9%、1952年的15.3%上升到39.6%。这种变化表明了中国已由解放前的农业国逐步向工业——农业国转变，为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但是，解放以来，我们在发展工农业的过程中，在解决工农业之间平衡发展中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只占工农业产

值的 17% 左右，而且大部分是轻纺工业，基本上没有机器制造业，只有一些维修和装配工业。农业更加落后，是极其分散的小农经济。加上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决定了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选择具有自己特点的途径和方法。

我们没有选择只发展农业的途径，即单纯指望出口农产品，以换回自己需要的工业消费品。这样做不仅国内的基础工业难以完整地建立和发展起来，而且出口农业初级产品还要被发达国家关税壁垒和国际市场价格所限制，使国内的农业也发展不起来。

我们也没有选择靠发展轻工业来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的途径，即单纯指望出口轻工业加工产品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工业设备技术和农产品。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靠出口轻工业品来进口粮食和副食品，解决吃的问题，靠进口农业原料解决工业生产需要问题，都不现实。且不说能否筹措到这么多的外汇资金，就是有了这笔外汇资金，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粮食、副食品可供输入，而只能着眼于国内发展自己的农业来解决。另一方面，只发展轻工业，不同时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就缺乏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这就是说，我国也不能把粮食、原料和工业技术设备问题的解决主要寄托在对外贸易关系上面。这是关系到我们是否能

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业化的问题。

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我们选择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途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求得工农业相互结合平衡地发展，并建立自己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样做，也有自己的问题和困难，在执行中有的时候工农业结合得比较好，有的时候结合得不好；有的时候是按照工农业同时并举的途径走的，而更多的时候是没有按照这个途径走下去。三十年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具体地说：

第一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我们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以156项建设为中心，推进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奠定工业化的巩固基础，现在看来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并取得了成功。在这个期间，我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4.5%；工业中生产资料平均每年增长25.4%，消费资料12.8%；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8.9%；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8.7%。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42.8%，农民的收入也有很大增长。这表明了工农业发展是比较平衡的，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也比较适应。成功的基本经验在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多发展一些重工业是客观的要求，而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一些。就是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比较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没有采取剥夺农民的过火措施；更多地采用一些经

济杠杆和正确的经济政策，把农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结果，既保证了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又保证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消费品比较丰富，市场比较活跃，工农生活水平提高得比较快。

但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缺乏经验，工农业之间已经出现了某些不平衡的苗头，主要表现在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不稳定，不得不对主要农产品（粮、棉、油）实行征购和派购，轻工业因农业原料供应有些紧张而受到一定影响，重工业产品生产则有些未能满足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需要等。因此，1956年我们明确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要求工业和农业必须平衡地发展，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在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可惜的是，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后来并没有真正执行，急于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

第二阶段，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特别是1958至1960年，即所谓“三年大跃进”，片面地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把钢铁作为中心，要在1958年一年内使钢铁生产翻一番（从535万吨提高到1,070万吨），其它一切都要为它让路。这样，大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随之往重工业投放，从而挤了农业和轻工业。成千上万农民丢下农活，上山采矿伐木，大炼钢铁，造成农业丰产不丰收。蛮干一年，并未如愿。1959年全国又掀起反右倾运动，批判不赞同“大跃进”的人，继续大上钢铁。结果，农业生产从1959年起连续大幅度减产，农业总产值1961年

比 1958 年下降 26.3%，工业生产 1961 年和 1962 年分别比上一年下降 38.2% 和 16.6%，工业劳动生产率 1962 年比 1957 年下降 5.4%，国民收入下降 14.4%。工农业严重不平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除了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以外，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计划工作失算所引起的。

第三阶段，1963—1965 年调整时期，由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迫使我们实际上从 1961 年下半年起不得不进行调整，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以恢复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这是对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的一种纠正。在计划安排上开始以农轻重为序代替重轻农为序。这种改变，体现着 1962 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它强调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是总结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的产物。

这种改变，在 1963—1965 年调整时期取得了成效，使工业和农业又得到新的平衡，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 15.7%，其中工业为 17.9%，农业为 11.1%，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 14.5%，全民所有制企业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 23.1%；全国职工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了 1.2%，农民增长了 4.4%。生产和市场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工农生活水平也开始回升。

第四阶段，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后的一年（1966 年至 1976 年），经过几年的调整，国民经济恢

复和发展得比较快，有些人的头脑又发热了，误以为“新的大跃进”到来了，于是又制定了发展重工业的高指标，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仍然没有抛弃“以钢为纲”的框框。如第三个五年计划要求生产 2000 万吨钢铁，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规定钢铁生产要求达到 3500—4000 万吨（后来不得不压缩到 3000 万吨）。由于在重工业生产上消耗的物资和劳动过多，使本来经过调整发展比较平衡的工农业又遭到破坏，加上在这个时期，林彪、“四人帮”捣乱，严重挫伤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 1967—1968 年的农业停滞、下降，按农业总产值计算 1967 年只增长 1.6%，1968 年减产 2.5%（粮食减产 4%），1971 年只增长 1.1%；轻工业和重工业在 1967 年和 1968 年也连续减产，1970 年也并未完成预定计划。工农业生产没有平衡地发展，实际上已开始慢性失调。这种情况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愈益严重，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第五阶段“五五”计划期间（1976—1980 年），从 1976 年第四季度起（即打倒“四人帮”以后）到现在，我们又一次头脑发热，犯高指标的错误，特别是 1978 年我们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规划，有点与 1958 年相象，如提出“六五”计划，生产粮食 4 亿吨，钢 6 千万吨，石油 2.5 亿吨，建设十个大庆，十个鞍钢，十个开滦，以及大量引进设备技术，这显然是自不量力的盲目冒进，如果说 1958 年是个“土冒进”，那么 1978 年则是个“洋冒进”，这给从 1979 年起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以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